

地方政府采购奢侈化为何此起彼伏

学者认为,遏制乱花钱冲动必须实现公示和问责

»聚焦

近日,一系列地方政府“奢华采购”事件正在网络发酵。针对地方政府部门频频出现的采购“奢侈化”的倾向,专家认为及时完善《政府采购法》和《预算法》是当务之急。

26日,一篇网络帖子披露了黑龙江省公安厅采购一台笔记本电脑要花41000元。这台天价笔记本电脑并不“孤单”。12月15日,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公布的招标公告指定了7台市价2300元的苹果i-Touch4当U盘,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贵U盘”。近日,一篇关于“苏州交警采购21台5999元的i-Phone4做警务通”的帖子也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另据报道,由于引发争议,该采购项目无人投标,目前“暂且搁置”。

而针对“天价U盘”,抚顺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李国强否认了“故意违规”的说法,承认是采购人员业务不精导致低级失误。目前,该网上招标公告中涉及的7台苹果i-Touch4采购计划已经全部取消。

日前,一篇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法院采购两台豪华电动按摩椅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引发众多网友

围观。这则“时间很短,规格很细”的豪华订单,也引起了大家的诸多猜疑。对此,水磨沟区委回应:此事出发点是好的,但怕被大家“越描越黑,现在已经被叫停。”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俊志告诉记者,这一系列的政府采购奢侈化案例其实也与2002年通过的《政府采购法》的漏洞有关,“比如法条中对于采购条件、采购范围设置不够明确,对于采购的门槛也设置过高,这导致能够参与政府采购的商家数量不多,这样过程就很难充分透明。”

此外,何俊志认为《预算法》目前也有瑕疵,因为现实中,人大或者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对于预算的监督主要是“事前监督”,着重于预算编制过程中的把关,但是对于执行预算以及决算的关注力度不够。专家认为及时完善《政府采购法》和《预算法》是当务之急。综合

»对话

在学者刘青看来,要想遏制政府采购中出现的乱花钱冲动,必须落实公示和问责制度。



刘青
江苏省党校政法政研部副教授

现代快报:这些引起争议的政府采购行为集中于年底,也造成了年终突击花钱的印象。

刘青:是的,这是一个必须提到的背景,因为有一些经费结余,要突击花掉。这类行为表明,乱花钱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而不客气地讲,这是为了满足个别公务员的私欲,这种私欲是用公共资源追求时尚。现在他们给出了很多理由,我觉得都是借口,也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多地方都出现了相关问题,就不是一个个案了,而是带有共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公共采购的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采购的目的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审批,使用单位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等,对这些问题缺乏把关。搞政府采购这么

多年,其实也发现了问题,但我们没有真正把制度落实到位。如果制度真正落到实处,那么就会有足够的监督机制,就会有足够的决策、执行、考核机制来保证。

现代快报:现在被披露的情况多是网友监督的结果,这种情形也带有偶发性。

刘青:关于政府采购,购买的单位和审批的单位往往不是一个单位,它们之间已经失去了相应的制衡。换言之,现有的政府采购的制衡制度不足,缺乏效果。而对其衡量的标准应该是,以真正能够代表大众、代表公共利益来衡量。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内部的监督机制几乎失灵,而外部的监督机制仅仅靠网民偶发性的监督。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有理由质问,没被报道出来的情况又有多少呢?打擦边球的情况又有多少呢?为什么这些政府机关总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去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呢?我想,这还是因为我们缺乏政府采购的监督制度。

现代快报:我们注意到,浙江、广东等多个省份都在推进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民意对这种改革也多有期待。

刘青:政府采购制度,是由国家层面统一一口来推行的,而由于这一过程中,各地的差异比较大,给各地留下了自主决定的权力很大,只是笼统规定了公开招标、集中招标等。这种情况下,对具体金额、产品有限制,但是出于何种目的采购,是不是有必要,就难以监督了。政府采购本来的目的是买一些必要的设备,更好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然而现在的很多情况已经

背离了这一要求。

现代快报:关键在于,政府集中采购本身就带有省钱的目的,而网友所批的“只买贵不买对”的情形令人难以接受。

刘青:是啊,本身就要求在控制财政经费的前提下,走市场化竞争的道路。

现代快报:以前也报道过,政府采购来的一些产品质次价高。

刘青:这就已经变了味了。政府采购,大到用的车,小到用的U盘,都出现了问题,引得网友产生反感。

现代快报:问题是,做错了,就该坦诚面对,该道歉的就要道歉,怎么能以那些雷人的理由回应人们的质疑呢?

刘青:这是一种糊弄行为。对他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给你一个交代,就可以了,我并不需要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我只要能给出一个我能想得到的理由就可以了。反过来讲,政府采购制度在这些地方已经被虚置了。

现代快报:如何遏制这种乱采购的冲动呢?

刘青:办法有很多,比如说公示。权力如果在阳光下运行的话,就不一样了。另外,还要进行问责。其实,相关的内部制度里也有这些内容,但是却既不公示也不问责。

现代快报:然而,问责时也会面对一个现实:集体行为,谁会承担责任?

刘青:这方面,确实有一个“法不责众”的问题。参与其中的人利益均沾,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谋利,而是为了一个小群体谋利。这样一来,问责确实难。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公开。

快报记者 刘方志

»今日视点

豪华动卧再证铁路“向钱看”的惯性

每年春运期间,都会出现一票难求的尴尬,奇怪的是,这一尴尬却一直持续着,即使是随着动车组和高铁的开通,也未见改变。这是为什么呢?也许大多数人会和铁路部门的观点一样,是因为春运期间人员流动大造成的,其实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按理说,随着动车组和高铁的开通,铁路运能应该是大大提高了,而实际上一票难求却没有解决。答案或许是:贵得离谱的高铁列车越来越多,普通列车却越来越少,而豪华动卧的开通,则是最新的例证。

12月28日的《东方早报》报道,自2011年1月11日起,上海与重庆、成都将对开动卧列车,16节车中只有两节是相对便宜的软座,其他都是昂贵的软卧。高级软卧成都到上海的最贵票价为2330元,堪比五星级酒店房价,而这还是打了7折的

价格。而事实上,上海到成都的铁路最需要的是普通列车。因为大量的四川、重庆籍务工人员,在长三角地区打工,春节期间,他们要回家过年,车票非常紧张。

春运前开通如此高价动卧,其目的就是要挤占铁路运能,继续维持一票难求的现状,换言之,铁路部门根本就没有想如何让更多的普通人方便地回家过年。豪华动卧是给普通人回家之路添堵的,绝不是帮他们回家的。

春运运能紧张,以目前我国的车制造和铁路管理水平,完全能够解决,特别是动车组和高铁的投入运营,大大提高了运输速度。我本来想,春运一票难求现象应该得到缓解了。然而,现实是除了票价大幅度上涨外,变化甚小。比如,490元至780元的武广高铁票比普通硬座高3.5倍!而即将

开通的上海与重庆、成都间的豪华动卧,更是让人无语。由此可见,在铁路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一边是一票难求被忽视,一边是想当然地开通花瓶式的豪华动卧,民意被忽视,民生被搁置。国家投资的铁路资源如此向钱看,怎能消除积聚在老百姓心中的“块垒”呢? (张魁兴)

铁路需要“穷人经济学”

近年来,中国铁路建设捷报频传,高速铁路创造了全球第一的“速度”,高速铁路总里程居世界第一。但这些炫目的光环,似乎并没能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事实上,当下急剧攀升的票价是普通乘客普遍难以承受的。这就意味着,铁路运输有“贵族化”的倾向。

每年春运,在回买票难时,铁道部总强调我国铁路运力有限,

人均里程不及一根香烟长。数据显示,目前建成并投入运营的高铁已达7431公里,到2020年还将建成1.6万公里高铁。而随着高速列车大量投入使用,普通列车班次将面临减少和停运。不难想见,普通乘客买票难、乘车难问题将更为加剧。

2005年两会期间,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我想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位经济学家叫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总理的“穷人的经济学”意味深长,希望一些政府部门仔细体会。和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一样,铁路当然也需要“穷人经济学”,保障普通老百姓坐得起火车的权利,远比开通所谓的豪华动卧来得重要。(纪卓瑶)

»公民发言

“异地高考”试点地方选错了吧!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试点地区名单,其中,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包括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和择校问题,探索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试点区域有山东省、湖南省和重庆市。(12月28日《成都商报》)

“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显然包括两个方面,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上学和升学。前一个问题在很多地方已初步解决,但更大的问题接踵而至:由于高考报名实行“学籍+户籍”双重认定政策,流动人口子女无法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试点就是要解决异地升学的困难。

但将山东、湖南、重庆选定为“异地高考”试点区域,实在让人看不懂。山东、湖南是人口输出大省,而非人口输入大省,重庆市也非人口输入大省。既然要探索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上学、升学的办法,就该选择外来人口较多的省市作为试点区域,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怎么能反其道而行之,将人口输出大省作为试点区域呢,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是什么?选择山东、湖南、重庆作为试点区域,推行改革的难度确实会小很多,试点成功的可能性确实较大,但这样的试点成功,其经验和教训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其做法并不具备推广价值,又有多大意义?

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必须解决,相关改革应当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只有选择外来人口较多的省市作为试点区域,才能在试点过程中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使试点成为推广的先锋。如果此项改革能够在北京、上海等地试点成功,何愁不能顺利推向全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已经滞后于时代,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教育改革要有紧迫感,再也不能四平八稳地迈碎步了。(晏扬)

»热点纵论

煤电抢利润不能总是拿消费者当炮灰

随着冬季用电最高峰的日益逼近,我国局部地区再次面临电煤供应紧张问题,不得不拉闸限电,煤电双方因此而产生的利润分配口水仗也愈打愈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秘书长姜智敏在情况通报会上表示:煤炭企业并非如传言所说“利润丰厚”,只有“约11%的正常水平利润”。之所以出现煤电企业利润上的差别,原因在于现在大部分煤价已经市场化,而电价却受到控制。姜智敏认为,相信电价调整的时间窗口到来后,这一矛盾将不复存在。(12月28日《京华时报》)

此前,随着一些地方的电荒开始出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曾表示,连年煤价上涨已令电企承受巨大压力,个别电厂甚至没

钱买煤。但中煤协却在通报会上说:中国不缺煤,也不会出现大范围电荒。个别电厂缺煤,是因为没做好储煤工作。

说到底,这是个利润分配问题,煤价和电价,都属于政府管制范畴。虽然中煤协说大部分煤价已经市场化,但专供发电的电煤的价格,却依然是受政府管制的。所以说,能不能在煤电企业之间实现平衡,让电力能够正常供应,需要政府部门做更多的工作。这里面有一个底线不能破,就是煤电企业不管怎么吵,都不能绑架消费者。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签订电煤合同,但煤电双方每年都要顶牛。中煤协与中电争得面红耳赤,无非就是争取给己方留下最大

的利润空间。利益协商不要紧,吵架也不要紧,但双方都不能把消费者当人质。可惜的是,每次煤电企业之间顶牛,消费者总会成为人质,成为双方争利空间的筹码。电荒的原因,正如中煤协所说,“并不缺煤”,无非就是双方没谈拢,部门电力企业借制造电荒来胁迫政府部门,以争取更高的利润。反过来说,如果电力企业的电荒政策得手,而电价无法上调,煤价势必降下来。煤炭企业一不乐意,煤荒很可能就随之而来。最后的解决之道,很可能就是中煤协所说的“电价调整后,这一矛盾将不复存在”。但大家都很清楚,不管是电荒还是涨价,最终为煤电企业利润之争埋单的,都是消

费者,而整个社会,还不得不在电荒中承受巨大的代价。

解决煤电利润之争除了牺牲消费者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当然不是,既然是国有垄断行业,既然是政府管制价格,政府就必须更强硬一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问责——有了煤荒要问责煤企、有了电荒就要问责电企,对国企负责人,没有比摘其“乌纱帽”更有杀伤力的了。但现实是,煤荒电荒经常看到,严格问责却是凤毛麟角。正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宽容,煤电双方才敢肆无忌惮地绑架消费者,才敢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更高利润。不从根子上解决电价,中煤协所说的“不会出现大面积电荒”,你敢信吗?(本报评论员 赵勇)